

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迁（1991—2017）* ——兼论柬埔寨华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黄晓坚

（韩山师范学院 华侨华人研究所，广东 潮州 521041）

〔关键词〕柬埔寨；华侨华人；华人社团；华文教育；华文媒体；华人参政；一带一路

〔摘要〕利用赴柬埔寨访问的第一手资料等文献，论文探讨了1991年实现和平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变迁：人口数量稳定增长；华人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华人在柬各行各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社团组织、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为支柱的社会结构得以维系和重组；华人参与柬埔寨政治仍然显示出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论文认为，为规避柬埔寨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推动中柬关系的平稳发展，推进“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要充分发挥柬华社群在中柬政治、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吸取以往投资大项目受阻的经验教训，增加在柬投资的透明度，并透过华文乃至柬文媒体进行正面宣传，减少阻力，赢取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中图分类号〕D634.3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162（2018）03-0030-09

The Changing Fea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 from 1991 to 2017 ——Analyzing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UANG Xiao-jian

（Overseas Chinese Research Institute,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Chaozhou 521041, China）

Key words: Cambodia;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community;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media;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Belt and Road

Abstract: Using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and other documents while visiting Cambodi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ing feature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 since the peaceful reunification in 1991. The popul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Cambodia has grown steadily, their economic strength has rapidly increased, and they have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various types of occupations in Cambodia. In addi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social structure, supported by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nd Chinese media, has been maintained and reorganized. However, the politics particip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ambodian indicates sensitivity and complexity. The study argues that it is vital to avoid the various risks that may arise in Cambodia. Furthermore it is imperative to promote a steady development of Sino-Cambodian relations and to ensure the fruitful resul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mplementation. Therefore,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mportant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Drawing lessons from

〔收稿日期〕2018-01-04；〔修回日期〕2018-04-23

〔作者简介〕黄晓坚（1961—），男，福建建瓯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潮学研究院）研究员兼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泰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侨乡文化（潮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华侨与抗日战争、侨乡归侨、当代海外华人社会等。

* 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特别委托项目《潮汕侨乡研究》（批准号：GD13TW01-11）之阶段性成果。

the experiences and obstacles of the previous investment projects, this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Cambodia will increase the transparency of investment in Cambodia and win the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of the local people through carrying out positive publicity on Chinese and even the Cambodian media and reducing resistance.

自 1991 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协助下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柬埔寨的政治发展和经济重建堪称稳定、成功,华人社会也随之浴火重生,走进了发展繁荣的新时期。遗憾的是,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的满目疮痍,人们对于柬埔寨及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及其在中柬关系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存在不少认识偏差。近十余年来,国内外学术界针对柬埔寨华侨华人社会现状不乏较深入的研究,如野泽知弘等人在其 2002 年 7 月进行的实地调查基础上推出的《柬埔寨的华人社会》系列研究,^[1]顾家赞所撰《“一带一路”视阈下柬埔寨华人华侨的群体特征》,^[2]王士录、高斌、庄国土、罗杨等人的相关研究,^[3]以及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4]但总体看来,成果数量仍然不多,尤其缺乏涉及当前华侨华人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关系的专门论述。本文拟运用笔者近期随《广东华侨史》调研团赴柬埔寨访问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它相关资料,^①就此做一综合研究,希望有助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华侨华人与柬埔寨经济重建

1979 年红色高棉政权瓦解后,其残余势力仍然控制着柬埔寨部分省份和地区,并在国外成立了一个被称为柬埔寨民主政权的反越南政府,与越南扶持的韩桑林成立的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势成水火。而在 1988 年之前,越南在柬埔寨也保留有 10 余万军队。这一时期,柬埔寨经济、社会持续动荡,成千上万的人因战乱、地雷而死亡、伤残。

在国际社会的斡旋和联合国的介入下,1991 年 10 月 23 日,参加柬埔寨问题巴黎国际会议的 18 个国家的外长、柬埔寨四方代表在《柬埔寨和平协定》上签字,宣布实行自由民主多党制和自由市场经济,联合国维和部队随即进驻,标志着延续了多年的柬埔寨战乱基本结束。根据《柬埔寨和平协定》4 个文件中的《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的相关规定,1993 年 5 月下旬,柬埔寨顺利举行了大选。大选后柬埔寨恢复了君主立宪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1998 年 7 月下旬,洪森领导的柬埔寨人民党在第二次全国大选中获胜,随之成立了以洪森为首相的第二届联合政府。至此,柬埔寨民族和解实现重大进展,政治局势和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步入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新时期。历经劫难的华人社会从此否极泰来,在柬埔寨的经济重建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一) 人口数量、地域分布及族群结构

经 20 余年的休养生息,柬埔寨华人处境得以改善,人口数量已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他们多为第二代至第三、四代的华人,属柬埔寨国籍,数量约有 80 万(约占柬埔寨人口的 6%);主要分布在首都金边市(约十几万人),以及马德望、磅湛、干拉、贡不、茶胶等省;祖籍主要是广东、海南和福建等省,其中潮州人最多(约占华人、华裔总数的 80%),广肇人次之,福建籍、客家籍华人较少。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潮州籍华人在族群规模、文化传统和经济实力上均独占鳌头,潮州话一直是柬华社会的通用方言,潮州文化在柬华社会中具有特殊影响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柬华社会仍然属于泛潮汕文化圈。

此外,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也很多,根据柬埔寨内政部的统计,这一群体在 2017 年已多达 30 万人,主要来自浙江(青田、丽水)和广西,广东(广州、潮汕)和福建(闽南)也有一些,多为

^① 2017 年 5 月,笔者随《广东华侨史》调研团访问柬埔寨,广泛接触到柬埔寨华人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获得不少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访谈资料主要来自柬华理事总会及各方言会馆、姓氏宗亲会的领袖以及华侨教师。

来柬做生意的商人，主要活动于金边市、马德望省和磅湛省等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能使用柬埔寨语，与当地入籍成家。由于入籍后可以购买土地和房产，有的新移民通过正规或非正规途径取得柬埔寨国籍，但均没有放弃中国国籍，回国仍持中国护照。

在海外，还存在着另一个以印支难民为主体的柬埔寨华人再移民群体，主要分布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仅在法国巴黎 13、19 区，就有五六万柬埔寨华人。柬埔寨实现和平后，这些华人有陆续返回柬埔寨投资者。当局格外重视对于这一群体的保护，若有针对他们的抢劫案件，破获后则一律对罪犯判以重刑。

（二）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

柬埔寨大选后，新政府着力发展经济，国家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华侨华人经济的发展尤为强劲。在柬埔寨，经商者中超过 90% 都是华人，而华人中超过 90% 的从商，华人几乎就是生意人的代名词。华人在柬埔寨各行各业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成为现今柬埔寨执政党及其政府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所倚重的力量之一。

1. 华人及华裔群体经济

柬埔寨和平以来，华人经济已经从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过渡到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新阶段。目前，柬埔寨华人经营的行业领域甚广，涉及房地产（包括酒店、购物中心等）、餐饮、制衣、旅游、银行、传媒、进出口、日用百货、五金机械、建筑、港口、种植园、渔业、食品加工、木材加工、烟草、矿业、石油以及与国外合资的大型工厂等，其中不乏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并涌现出一批华人企业集团和华人富豪。其中最著名的柬埔寨富豪大多是华人或带有华人血统者，详见下表。

柬埔寨华人十大富豪及其从事行业

排名	企业家	主要从事行业
1	陈丰明	电视、网络、移动通讯、彩票、银行、金融、保险、酒店、旅游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农业、能源、教育、贸易、高新科技
2	李永法	地产、卫星城、电力、电视
3	蒙乐提	农业、港口
4	徐光秀	烟草、工业、机场、商务广场
5	符国安	捕鱼、烟草、电力能源、水利、赌场
6	周速光	酒店、旅游、石油
7	刘明勤、杨丹葡	盐业、矿业、药品进口、酒店
8	方侨生	银行、金融、度假村、卫星城、购物中心、工业园区、农产品加工、生物能源、传媒
9	林秋好	港口
10	杨启秋	进出口贸易、货仓工业、报关运输、建筑、农业、经济免税特区、化肥和贸易

资料来源：《柬埔寨十大最具影响力勋爵出炉：华人占七席》，《吴哥时报》2015 年 8 月 5 日；《柬埔寨最有钱的人全在这了，基本都有中国血统》，《吴哥时报》2016 年 9 月 13 日。

另据统计，在柬埔寨媒体 2015 年公布的十大最具影响力勋爵之中，华人、华裔勋爵就占了 8 席，^① 他们是：陈丰明、杨丹葡、李永法、周速光、蒙乐提（华裔）、符国安、方侨生和黄文虎。获取王室颁授勋爵的殊荣需要为国家在经济上做贡献，^② 由此可见柬华群体超强的经济实力。诚然，柬埔寨

^① 见 2015 年 8 月 5 日《吴哥时报》。若算上华人与越南人混血华裔周速光，则为 8 席。

^② 根据柬埔寨王国政府 1994 年的规定，对国家贡献 10 万美元财物的热心人士，有资格由政府向国王申请册封“勋爵”称号。从 1994 年至 2014 年 2 月，该国共有 704 人被册封为勋爵。

寨华人经营的企业绝大多数仍属中小企业，从事流通领域的小本经营，但资本雄厚的大企业家已进入金融、电信、房地产等重要行业，对柬埔寨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

祖籍潮州的陈丰明（Kith Meng）建立了商业帝国“皇家集团”（Royal Group of Companies），其成长经历无疑最富传奇色彩。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是印支难民的陈丰明从澳大利亚返回柬埔寨，协助兄长打理战后被归还的家族生意。开始，陈丰明只是给联合国驻柬埔寨机构供应家具、食品和办公设备，后来取得佳能复印机在柬埔寨的独家经销权，并以敏锐的商业嗅觉率先与摩托罗拉、米雷康姆国际移动通信公司等外资合作，创建柬埔寨最早的无线通信网络和国内最大的移动通信运营商——MobiTel公司，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1994年，其兄长神秘遇害后，陈丰明接管了家族生意，并将业务陆续拓展到保险、电视网络、移动电话、教育、运输、广告与娱乐、酒店和度假村、房地产、彩票甚至金融与银行等重要经济领域，其掌管的“皇家集团”旗下至少有23家子公司，是柬埔寨首屈一指的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2015年，陈丰明以50亿元的财富荣登“2015瀚亚资本·胡润全球华人富豪榜”，成为柬埔寨首富。

加华集团总裁方侨生的创业史也值得一表。方侨生祖籍广东普宁，也是印支难民，20世纪70年代末从柬埔寨逃亡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在那里他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成为加拿大籍柬埔寨华人。2000年，他敏锐地意识到，海外50万柬侨若以年均3万英镑收入计，即拥有相当于柬埔寨年产值的巨大财富，是个可资利用的重要群体，遂组织起海外柬华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国的华侨投资公司）。此后，他创建加华集团，其属下的加华银行发展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商业银行（其它的华人私人银行有湄江银行等）。加华银行不但向工商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且面向广大农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获得了政府的赞许。目前，该银行已在全国各省设立了至少56家分行，并将业务拓展到老挝、马来西亚和泰国。此外，方侨生还在西哈努克港建起了度假村，在金边拥有3家购物中心。

2. 华侨群体经济

自20世纪90年代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赴柬经商的中国新侨日益增多。他们以个体或私营公司的身份，从事特产和大米贸易、房地产投资、工程承包、餐饮、制衣以及电器和建材的销售等行业。从事特产贸易的新侨多集中在邻近越南的磅湛省，从事大米贸易的则主要在靠近泰国的马德望省，投资房地产项目的公司如太子集团，主要在金边市和西哈努克港。从新侨的来源地看，做建材、石材生意的多为福建人和潮汕人，他们将大量花岗岩、大理石从中国运抵柬埔寨，以满足柬埔寨火爆的房地产发展的需要；做电器销售的则多为广州等地的商人。

新侨在柬埔寨成功立足后也乐于回馈当地社会，特别是在华文教育方面。如柬埔寨福建会馆所属的民生学校，近年来每年都会收到来自新移民团体柬埔寨福建总商会两三万美金的捐助，可资助五六十位学生，而且对于学校的需求，一般都会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必须指出的是，华人华侨经济的快速发展，除了获益于柬埔寨实行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外，还仰赖于柬埔寨相对稳定的政局和长期奉行的亲华政策。与历史上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等东南亚民族主义国家华人经济的特点相类似，在柬埔寨，但凡发展得好的华人企业家，几乎无不带有官方、党派的深厚背景。他们或担任洪森总理的私人顾问、与洪森有特殊交情、亲属在洪森警卫队中任职，或担任柬埔寨的参议院议员。

二、柬华社会结构的维系与重组

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内战、红色高棉的浩劫及逃亡后，柬华社群不但人口锐减，社会结构也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因此，在柬埔寨社会局势逐渐安定后，为了柬华社群的团结互助和永续发展，华人社会在社团组织、华文教育和华文媒体的恢复和重构工作中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一）社团组织的重构与新建

柬埔寨华侨最早的社团组织系成立于1814年的七个帮会（广东、福建、潮州、客属、海南、福

州和琼州), 法国殖民时期整合为广东、福建、潮州、客属、海南五大帮会, 并由五大帮长合议设置“五帮调解委员会”(后称“五帮公所”), 藉以调解仲裁华侨社会内部纠纷, 传达贯彻殖民当局的行政命令。1958年后, 尽管因帮会制度解体、“五帮公所”机构多有改名和兴废, 但五大会馆的传统却得以延续下来, 直到1970年柬埔寨内战爆发后才被迫停止活动。

1990年12月26日, 在人民党的支持和鼓励下, 柬埔寨成立了全国性的华社最高领导机构——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多年来, 在杨启秋勋爵等历任会长的主理下, 该会稳健发展, 会务繁盛。历经几次变革与调整, 该会目前辖下共有5个方言会馆、6所公校(仅金边)、13个姓氏宗亲会, 以及68个遍布于全国各省、县的地方柬华理事会。此外, 该会还在金边周围拥有6座华人庙宇和狮队、联谊会等外围组织。目前, 这一机构主要侧重于联络各处华人、举办华文教育和传承传统文化。

潮州、广肇、客属、福建与海南会馆, 是柬华理事总会辖下最重要的社团组织。这几大会馆均以庙建会, 有自己的学校——通过办学创收养会; 有自己的墓园——贫寒华人病苦、丧葬可得到会馆捐助; 有自己的活动——每逢节日举办节庆庙会活动。以潮州会馆为例, 该会馆重张于1995年, 供奉玄天上帝。此后, 它接管了柬华理事总会于1992年复办的端华学校, 后来又办起了规模更大的分校和夜学; 还负责管理潮州义地, 出资购置了一块新的义地; 与海内外各类华人社团组织联谊往来, 藉以交换资讯、捕获商机, 也是它的一项重要工作; 每年还负责举办春节舞狮、元宵游神(正月十三至十七)、孟兰胜会, 以及在清明等节日举办庙会。显然, 主办华文教育、管理庙宇义地、开展公关联谊和举办节庆祭祀活动, 已成为地缘性会馆的主要职能。

血缘性的姓氏宗亲会是柬埔寨另一类型的重要华人团体。这类团体有些属于复办, 如成立于1961年的黄氏宗亲总会, 2011年新会址落成, 翌年即主办世界黄氏宗亲总会的恳亲大会。该会目前有200多户会员, 没有固定收入来源, 活动全靠会员出资。该会复办以来做了很多善事, 如为每年的孟兰胜会提供大量祭品, 近年来每年都到中国参加联谊活动。林氏宗亲会是柬埔寨13个姓氏宗亲会中财力最强的, 由美籍柬华宗亲支持, 从2001年开始建会, 该会仅购地就花费了十几万美金。成立以来, 每月十五均有聚会, 由会长等轮流出资提供八果供奉林默娘祖姑。该会曾举办三次就业咨询会, 邀请柬埔寨教育部部长莅临。其属下的林氏青年团在各宗亲会中也是规模最大者。鉴于红色高棉时期柬华各姓氏宗族社会已被完全拆解, 族谱资料均已遗失殆尽, 老一辈柬埔寨华人尚能在甫立脚跟之际不忘祖德、重建宗亲会, 足见其所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之深。

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已有逾30万来自中国大陆及港台、新马等地的华人涌入柬埔寨投资、创业和生活, 并悄然构筑起以业缘、地缘为主体的社团组织。尤其是2010年以来, 在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推动下, 有多达25万的中国新移民涌入柬埔寨。有因支教、援建和受私企雇用而到柬工作的青年专业人员, 更多的则是在同乡、同学、朋友等的介绍、援引下赴柬淘金创业的中小企业主、商人等。在早期, 旅柬中国商人多为国企干部和援建专业人员, 当时成立的以公司企业为主体会员(现约有100家国企)的柬埔寨中国总商会最先担负起了联谊职责, 但很快就不敷需要, 纷纷成立了以各省、市地域命名的“柬埔寨某某商会(工商联合会)”或“柬埔寨某某同乡会”作为下属机构。这些机构加上若干半官方机构、自发性业缘组织, 形成了目前柬埔寨中国新移民社团的基本格局。有别于传统华人社团, 新移民社团的日常工作以会员联谊、对口接待、商机交流、招商引资、急难救助和慈善捐助为主, 更加重视通过社团平台建立与同行和外界的商业网络, 以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 促进事业发展。新老华侨、华人社团及其成员虽有频繁互动和密切交往, 但各自职能属性和工作重心界限分明, 难以替代、整合。^[5]

(二) 华文教育的推展

华文教育在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到1901年潮州同乡会在磅湛成立的新民小学。但自20世纪70年代华文学校遭查禁、红色高棉时期华文绝迹后, 华文曾一度退出柬埔寨的社会生活, 华人只能以家教形式私下传授华文。直到1992年下半年, 以“金宝殿”酒店华文招牌的出现和

新加坡华语影片《妈妈心碎了》的播映为标志，华文才开始逐渐解禁，华文教育重新开放。

如前所述，柬埔寨华人社团重构后最注重的工作就是重振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柬华理事总会成立后，立即推动华校陆续复课。华社领袖不仅慷慨出资购置校舍，派人赴马来西亚取经、延请华文教师，还从周边国家收集华文教材，编辑后送越南印刷成书后运回柬埔寨供华校使用。在华人社团的全力主持下，柬埔寨全国各地陆续复办或新办了一批华文学校，至2017年已有55所，在校学生约5万人。^①华校按柬埔寨学制采取半天华文、半天柬文（或英文）的教学模式，学生可以从幼儿园一直读到初中，个别华校还开了专修（二年制，相对于高中）课程，不仅接纳了大量华裔子女，而且因就业前景看好，也吸引了不少柬族、越南族、占族子女入学。因柬埔寨大学未设置汉语课程，不少人大学毕业后还特地进入华校夜学学习华文。

众多华校中，以百年名校——端华学校最著声誉。该校1907年由潮州会馆在金边创办，不仅是柬埔寨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华校，更是柬埔寨华文教育的中心。该校现有两个校区，共有200余名教师、1.5万余名学生（其中校本部2000多名），其规模傲居东南亚乃至海外华校之首。此外，客属会馆主办的崇正学校、广肇会馆主办的广肇学校、福建会馆主办的民生学校和暹粒省柬华理事会主办的中山学校等也都颇具规模，在校师生达数千人。

但是，与泰国、印尼、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一样，由于没有被纳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柬埔寨华文教育依然饱受办学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问题的困扰，有待于柬华社会的继续努力和中国汉办、侨办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华校培养出一批批毕业生，已经在柬埔寨的旅游、外贸、金融等行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提升华文教育层次，目前，柬华理事总会已在酝酿创办华文大学——理工大学。相信假以时日，柬埔寨的华文教育或将迎来新的历史性跨越。

（三）华文媒体的活跃

与华文教育一样，柬埔寨华文报刊自1967年遭到查封后，长期处于被禁状态。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华语华文的合法化，在华商资本的涉足下，华文报刊才陆续复办面世。

柬埔寨最早出现的华文报纸是1993年创刊的《华商日报》。2000年，《柬华日报》问世。此后陆续创刊的还有《新时代日报》《大众日报》《星洲日报》《高棉日报》和《金边晚报》等。这些报刊一般均靠广告来维持费用，发行量在3000份以内，但对外号称万份。只有《高棉日报》没有对外延揽业务，只打自己的广告。目前金边仍在发行的报纸有《柬华日报》《华商日报》《星洲日报》《高棉日报》和《金边晚报》五家，其中《柬华日报》是柬华理事总会的喉舌，《华商日报》是现任柬华理事总会会长方侨生投资经营的。

一方面由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由于网络尚不够发达，因此，阅读报纸仍然是金边市民的生活方式。虽然很多柬埔寨人已会讲华语，但有能力阅读华文报纸的还不多，华文报纸的主要受众还是新老华侨、华人社群和中资企业人员。

三、柬埔寨华人的政治参与

跟泰国相仿，相对于其它东南亚国家，柬埔寨华侨在血缘、宗教及文化上，长期以来都与当地人民高度融合。即使经历红色高棉的冲击，其正直诚信、和气生财的群体形象亦未丝毫受损。战乱之后，绝大多数华侨更是加入柬埔寨国籍成为柬籍华人，在柬埔寨现行的自由民主多党制的宪政框架内具有合法的政治权利。因此，从理论上说，柬埔寨华人具有良好的参政基础。

事实上，柬埔寨华人曾经有过不凡的参政历史和业绩。早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即有广东普宁籍华人黄意从政。1901年，他从做砺清杨省专员公署翻译秘书开始，历任王国首相府秘书、砺清杨省等八省省长、国家内政部兼宗教部部长、宫廷部与财政部大臣等重要职务，1945年出任法国保护

^① 柬华理事总会常务副会长、柬埔寨广肇会馆会长蔡迪华口述，2017年5月9日。

国——柬埔寨王国的首相，1955年改任独立后柬埔寨王国的最高顾问。他在政界颇有建树，再加上清正廉洁，深孚众望，柬埔寨国王授予他柬埔寨王国大十字架勋章，被誉为大元帅黄意勋爵，后又被封为亲王。他举荐小王子西哈努克作为王位继承人、到越南西贡陪其回国登基，并殚精竭虑地辅助年幼的西哈努克国王处理内政外交事务，为柬埔寨摆脱法国殖民统治、实现国家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6]

和平以来，柬埔寨华人参政的步伐亦从未间断。洪森总理的父亲是潮州华人，夫人则是地地道道的第二代海南文昌人，洪森本人也曾多次承认自己具有华人血统。他的内阁成员及由他主理的柬埔寨人民党中亦不乏华人、华裔政治精英活跃的身影，其中一半以上的内阁部长，以及曾任首相秘书的占比塞和索安等人都有华人血统。在柬埔寨第一反对党——柬埔寨王国救国党中也有很多华人，如杨才英、宋方、莫淑华等人。救国党主席金速卡的密友兼顾问刘蒙海、律师黄祖义甚至前任主席沈良西夫妻，也都是柬埔寨华人。

尽管如此，柬埔寨华人的政治参与仍然有一定的敏感性和复杂性。

（一）华人与柬埔寨人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

1953年，前法国殖民时代移居柬埔寨的第一代华侨及其后裔几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柬埔寨人与这一少数群体无论在经济地位和本土意识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异和竞争，这种差异和竞争在柬埔寨独立后进一步凸显。实际上，20世纪50—70年代西哈努克和朗诺政府就曾实行对华侨的限制、排斥政策，所幸只局限在经济、文教领域，没有酿成大规模的血腥排华事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就是柬埔寨人与柬华群体在民族利益、思想观念上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90年代至今，获益于柬埔寨相对稳定的政局和柬中友好的国际关系大气候，加之柬埔寨百废待兴、急需华人社会参与重建和发展，柬埔寨人与柬华并未产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总的来说还是互相尊重的。

因华人在柬埔寨多年来的高速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洪森政府甚至公开鼓励华人参政，藉以了解华人的诉求。即便这样，华人参政仍然是疑虑重重，步履蹒跚，其中的权力利益问题很复杂。有的侨领认为，目前华人参政仍然比较敏感，洪森本人可能不计较，但其属下很可能反对。^①

（二）华人群体自身身份认同和政治倾向的分化

柬埔寨实现和平以来，华人社会已逐渐由第一代移民为主体，过渡到华人第二代唱主角，第三代华人也已开始崭露头角。目前，柬埔寨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两党势均力敌，联合组阁执政，得到众多柬华老一辈的支持；而沈郎西党和人权党联合成立的第三党——救国党，则更多地受到以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工人、市民为代表的柬埔寨华裔新生代的拥护和追随。这也显示了柬华第二代、第三代在参政理念及实践上的分野。

第一代、第二代华人因亲身经历当代柬埔寨政局演变及其带来的惨痛创伤，珍惜和平环境下的发展机遇，满足于现状，认为“我们只要多赚钱、做慈善、办华文、助政府就好”，^②对于参与柬埔寨政治仍然心怀芥蒂，加之老一代柬埔寨华人由于传统重商，文化水平低、不能熟练掌握柬埔寨语，其参政意愿和能力均不可避免地遭到削弱；而第三代华人则普遍获得良好教育，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观，具有更高的参政热情；柬埔寨华裔新生代则一般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柬文和英文能力也较强，因此具备较高的参政素质。

随着柬华第三代、第四代的不断成长，在柬埔寨式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的长期陶冶下，这一群体未来必将更深地参与柬埔寨政治，在柬埔寨华人参政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① 柬华理事总会会长、加华集团总裁、加华银行董事长方侨生口述，2017年5月12日。

② 柬华理事总会常务副会长、柬埔寨广肇会馆会长蔡迪华口述，2017年5月9日。

四、柬埔寨华人对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柬埔寨是东南亚经济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它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外资可拥有 100% 股权，采用美金交易结算，资金可自由汇出，因此成为外国人投资的一处宝地。

最近十余年来，中柬经贸关系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商品结构互补性强，大量中国电器、纺织品和建材输入柬埔寨，并由柬埔寨输出橡胶、木材和大米等物资。与此同时，大量中国资本通过国企和私企等渠道涌入柬埔寨，极大地推动了柬埔寨经济的繁荣。制衣业、旅游业、农业是柬埔寨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也是中国企业投资最多的行业。以制衣业来说，1994—2008 年，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共批准外国制衣企业 583 家，其中中国企业就有 204 家，占三分之一。中国一直是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 1—11 月，中柬双边贸易额达 52.7 亿美元。截至 2017 年 10 月，中国累计对柬协议投资 125.7 亿美元，是柬最大外资来源国，占柬吸引外资总额的 36.4%。^[7]

在两国关系方面，自 1955 年万隆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结识柬埔寨领导人西哈努克、1958 年中柬建交起，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柬埔寨王室，双方结下了深厚的传统友谊。从冷战时期开始，柬埔寨一直都将中国作为其战略依托和坚强后盾。柬埔寨进入和平与发展新时期后，以洪森首相为代表的柬埔寨政府一直采取对华亲善政策，2010 年后更将中柬两国关系提升和定位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的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经贸和外交领域，而开始向区域政治、安全和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延伸，显示出良好的政治互信。

基于上述背景，自 2013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倡议以来，柬埔寨作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相关方一直备受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与之相对应，柬埔寨政府也十分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全方位关系，支持中国倡导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洪森首相表示，中国提倡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非常适合于柬埔寨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洪森首相秘书索安曾指示柬埔寨有关方面翻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的著作，加以研究、呼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柬埔寨十分倚重中国的作用，两国合作建设了不少大的项目，最近还拟与中国合作建设金边至西哈努克港的高速公路以及吴哥的新机场。在近年来发生的南海主权争端等重大事件中，柬埔寨也适时给予中国坚定的支持，彰显了中柬两国关系的特殊性。

然而，作为中国推进“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成功样本，中柬两国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仍然可能受到柬埔寨国内政党轮替、对外政策变化（因受到东盟的牵制）和美国因素的诸多影响，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8]因此，如何借助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力量对风险加以规避和化解，在中柬两国业已初步达成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金融融通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进一步强化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就成为需要统筹和规划的现实课题。这关系着中柬政治、经贸关系的稳定和中国“一带一路”海外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而且也关系到百万柬埔寨华侨华人社会的长远福祉。为此，有必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重视华人社团、老一代华商在经贸领域的咨询、引领作用，增强在柬投资的透明度和正面宣传

最近 27 年来，柬埔寨华侨华人社会逐渐形成了以柬埔寨华侨理事总会和柬埔寨中国总商会为龙头的两大社团体系。^①前者代表老一代华人及华裔社群，与柬埔寨政界关系十分密切；^②后者代表新一

① 此外，中国港澳侨商会作为柬埔寨三大华侨华人社团之一，也具有一定影响力。

② 例如，柬华理事总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方侨生，既是全国最大商业银行——加华银行的董事长，也是总理洪森的私人顾问。他上任后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成立经贸促进处，公开华商所拥有的资源并开始招商，为来柬埔寨投资的全球华商和企业服务，为钱找项目，为项目找钱。柬埔寨的陈丰明，2000 年当选柬埔寨商会会长后，成为政府一位实质性的对外发言人，负责向潜在的外国投资者推介项目，积极奔走于中资企业之间。

代华侨群体，更注重与中国的关系。二者虽互有联系和交往，但界线和职责相对分明。就中国对柬投资方面来说，能否有效发挥华人社团、老一代华商在经贸领域的咨询、引领作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投资的成败。此外，随着中国大型投资项目的增多，一些项目在环保、征地等问题上与当地民众产生矛盾纠纷，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此，有必要吸取以往中国大型国企在缅甸等国投资大项目遇阻的经验教训，增加在柬投资的透明度，并通过华文媒体乃至柬文媒体进行正面宣传，以减少阻力，赢取当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

（二）加大华文教育投入力度，培养新一代对华友好力量

在东南亚地区，柬埔寨的华文教育是除新马外发展最好的，也是华侨华人社团最为关注的工作领域。即便如此，由于缺乏国家拨款和经常性捐助，华校基本上是依靠自身的创收能力在顽强地支撑着，师资不济、教材匮乏。虽然汉办、侨办不断外派教师、赠送教材予以支持，但还需要制定根本性的对策加以解决，如在柬埔寨当地设立师范培训机构、结合本土知识编纂课本等。只有这样，才能在华裔新一代中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并影响在华校中就读的柬埔寨其它民族学生，培养新一代对华友好力量。近来，柬华上层已有设立华文师资培训中心和创办理工大学的意向，我国教育部门和侨务部门可积极应对、推动。

（三）密切广东及潮汕侨乡与柬埔寨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交往，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和向心力

前文已述及柬华社会与潮汕侨乡的密切关系。鉴于柬埔寨华人社团对寺庙、节日和民俗文化传统的重视，以及近年来柬华群体与广东、潮汕侨乡的联系愈发紧密，广东和潮汕地区有关部门可发挥柬埔寨侨务资源的独特优势，鼓励通过民间的渠道，进一步推动广东及潮汕侨乡与柬埔寨华人社会之间的民俗文化交往，同时加强侨乡文化的保护、建设和研究、宣传，藉以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向心力。

【注释】

- [1] 陆续刊载于《南洋资料译丛》2007年第3期、2011年第4期、2012年第2期、2012年第3期、2013年第1期。
- [2] 参见《亚非研究》2016年第1期。
- [3] 参见王士录：《柬埔寨华侨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高斌：《1980年代末以来柬埔寨华人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3年第2期；庄国土：《二战以来柬埔寨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南洋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罗杨：《“香火”永续：柬埔寨华人社团百年变迁》，《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 [4] 参见赵凌云：《1980年代以来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研究》，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张悦：《柬埔寨的华教社团及其对华文教育的影响》，中山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何涵妃：《华侨华人在中柬关系中的角色研究——1991年至今》，广西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蒋赐玲：《柬埔寨〈华商日报〉新媒体转型研究》，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
- [5] 陈世伦：《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5期。
- [6] 黄庆华：《我的老叔是原柬埔寨首相黄意》，《海内与海外》2004年第4期。
- [7] 新华网：“中柬企业贸易对接公暨签约仪式金边举行。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1/08/c_129785659.htm。
- [8] 中国网：《“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柬埔寨》，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7_136517.html。

【责任编辑：李斌斌】